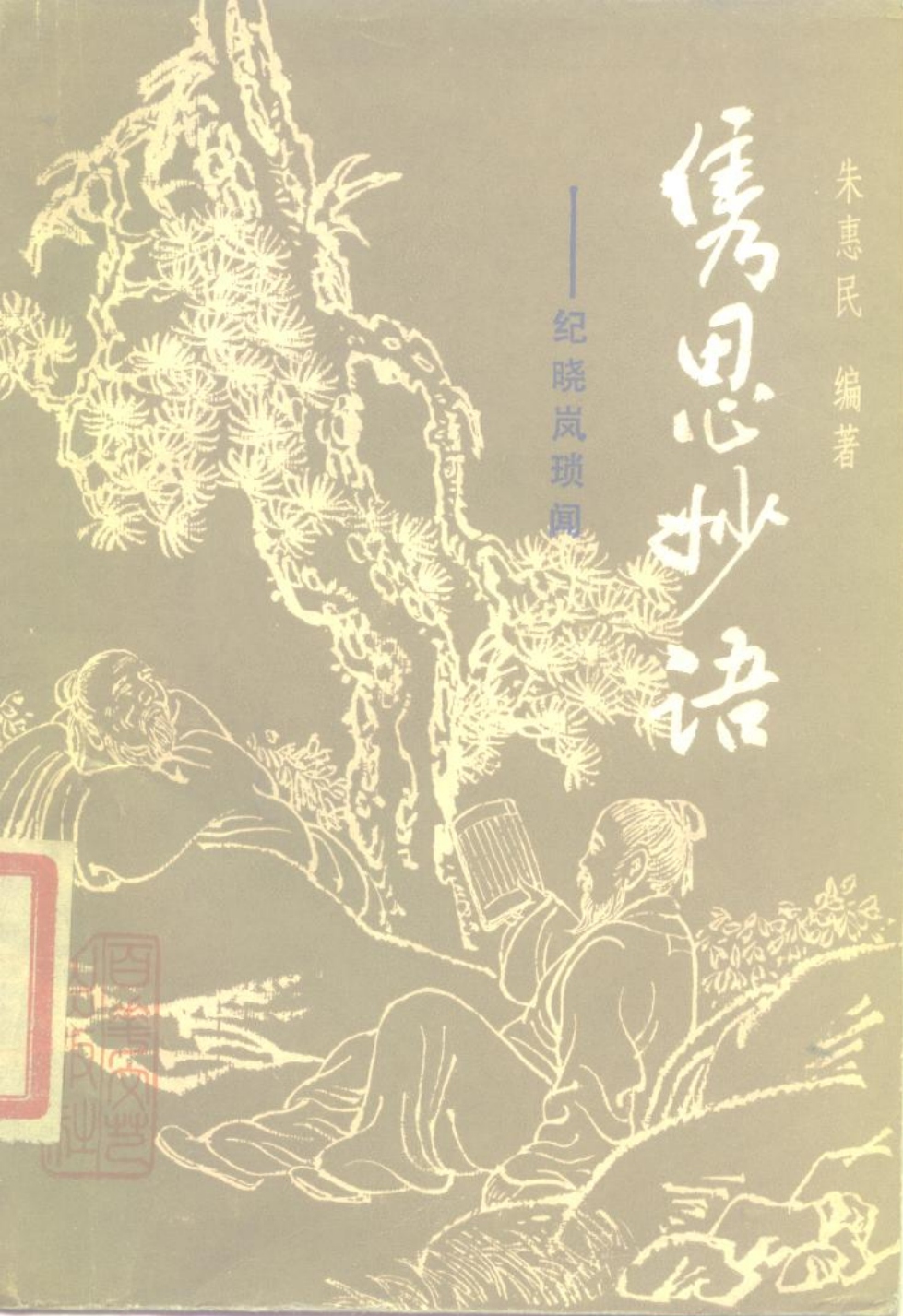


朱惠民 编著

侯思妙语

——
纪晓岚琐闻



隽思妙语

——纪晓岚琐闻



尾花装饰：胡连江

集思妙语

——纪晓岚轶闻

朱惠民 编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8 插页2 字数94,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10151·791

定价：0.88元

序

柳 溪

—

我小时候——从童年有记忆开始，就对我的太高祖纪晓岚，怀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和怀念。因为我们这个纪氏家族，把这位清朝乾隆皇帝陛下的大学士、大学者，也是大官吏，当成了我们家族的荣耀和骄傲。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家的书橱里摆着他大量古版线装书的浩瀚著作，他的画像和名贵的视谱，而且还因为这位老祖宗在那个时代荫庇了他的后代子孙。无论是我那做过道台的祖父，还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榜秀才的我的父亲，都向我们津津乐道他那坎坷奋进的生平和诙谐有趣的轶闻。“南袁（枚）北纪（昀）”或“南蒲（松龄）北纪”之说，标志着他在世人眼里的地位。在旧社会，我们的家世和门第，常常受到世人的青睐和尊重，也受到官场的重视和提拔，只要我们一提他的名字或谥号文达公，那么就经常会受到人们的恭维和夸赞，说我们这些晚辈人，才真的有资格被称为“书香门

第”——这当然是得自旧社会的阶级论和血统论。我记得我的祖父和父亲还为此刻有一方“纪文达公后人”的图章，以示门第的挺阔和高贵；我还记得每当我父亲失业饿饭时，也多以“纪晓岚五世孙”的身份又谋得了职业。我就是这样一个家族门庭里熏陶长大的。

青年时代我承受着两种社会压力，一是封建倒退，一是帝国侵略，这是两座沉重的大山，也是一片黑沉沉的大海。恰在这时，为了不当愚昧的殉葬品和不做受欺凌的亡国奴，我接受了马克思的进步思想和党的教育、领导，走向了革命、背叛了我的家庭。可笑的是，当我暗地里为党做着地下工作时，也仍然是受到了我们这位老祖宗显赫名声的福荫，就凭我这个家庭出身，我便打到了沦陷后期伪华北最高官吏的家里做了家庭教师。

后来我暴露了目标，无法隐蔽，不得不逃离和撤退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却是和旧社会绝然不同的一个崭新的天地。纪晓岚的名声虽然依旧响彻他的故乡，但他在农民翻身的伟大土地改革运动中，却被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人物而加以批判的。在农民冲进他的老宅时，不仅焚烧了许多纪晓岚的古版书的著作，打碎了不少名贵的石砚，甚至把他的好友刘鏞送的礼品砚石、乾隆皇帝御赐的匾额也都投入了熊熊大火。随后是扒毁了房屋，砸碎了祠堂。我想这是因为农民在长期封建剥削社会里，饱受他的某些后人的凌辱与欺压后的复仇与报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难道俄国的革命士兵在冲进冬宫砸碎那些珍宝器皿时，不

也是受着和中国农民同样情绪的支配吗？但幸好当时由于上级发觉的及时，终于制止了这次农民运动对文化的洗劫。我从这时起，就变成了一个“封建余孽”。可笑的是，革命的热情使我也着了魔，我不由得也中了左倾的病，在那股连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还要按照阶级成份划分等级而建立领导班子——“贫农团”的极左浪潮中，我自然变成了一条愿意革命的蹭墙根的狗，从此，我便以我的出身为莫大的耻辱。我们姐妹和侄辈们，坐在一起聊家常时，总是要抱怨一阵我们的祖先，抱怨我们这一代人不象我们的父辈那样得到实惠，却两手空空地挣了一顶“破落官僚地主”的帽子。同一个家族，在旧社会宠坏了许多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而在新社会，又摒弃了许多愿意革命的奋发有为的青年，“血统论”之非科学性和可厌，由此可见。我国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孙犁同志写给我的那封《关于纪昀的通讯》中曾说：“虽然我们相识几十年了，我还不知你是纪昀（晓岚）的后裔，实在不敬得很。”为什么我们在解放区时同住在《冀中导报》的那个大梢门的院子里，就会不知道我这段过去颇有点“光荣”的家史呢？原因就在于在那些越来越“左”的年代，我自己真的从内心中感到羞耻而又怕被斗才隐瞒着同志们的。（当然组织上是知道的）。即使是这样，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浩劫是可想而知的。我的父亲做为纪晓岚的“五世孙”而被红卫兵抄家，并罚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跪在院里焚烧我家有关纪晓岚的藏书和他的字画，于是他因巨大的悲痛而摔倒了，

从那以后人事不省，一命呜呼。连我那不太识字的寡嫂，也因为是在纪晓岚的“六世孙媳”，而被罚扫街。但是那个可怕的令人悲愤的恐怖时期，终于随着一声十月春雷的巨响而宣告永远地结束了。在拨乱反正中，对于我的先祖，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功绩与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予科学的评价。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孤石老人，观弈道士。生于一七二四年，卒于一八〇五年。传说中，幼极聪颖，一目十行，且能过目成诵。至今为乡里人称颂。还说他“暗坐能烛物”（我想他也许有点特异功能）。关于他的为人，也有过这样的记载：“性坦率，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

我们中国的大文豪、思想家、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对他做出了崇高而公允的评价，这是绝不可忽视的。鲁迅说：“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度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说到我祖先的全部历史，鲁迅先生做了这样具体的总述：“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父容舒，官姚安知府。昀

少即颖异，年二十四领顺天乡试解额，然三十一始成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读学士，坐泄机事谪戍乌鲁木齐，越三年召还，授编修，又三年擢侍读，总纂四库全书，馆书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悉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中，故他撰著甚少。后累迁至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自是又为总宪者五，长礼部者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二十）。乾隆五十四年，以编排秘籍至热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乃追录见闻，作稗说六卷，曰《滦阳消夏录》。越二年，作《如是我闻》，次年又作《槐西杂志》，次年又作《姑妄听之》，皆四卷；嘉庆三年夏复至热河，又成《滦阳续录》六卷，时年七十五，后二年，其门人盛时彦合刊之，名《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本书）。十年正月，复调礼部，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二月十四日卒于位，年八十二（一七二四——一八〇五），谥“文达”（《事略》）。”

以上所引，可见鲁迅先生对他知之甚详。说到纪晓岚的著作，鲁迅先生给予过这样公允的评价：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谈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皆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涂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

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鲁迅先生在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功过时，说他在《阅微》中“过偏于议论”，是因为他“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我认为这不仅是鲁迅先生的真知卓见，也是他在研究学术时的公允和科学态度。但更令我钦佩的则是鲁迅先生英明的预见性，他指出正因为他想“更欲有益人心”，而“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他的预见果然丝毫不差，有许多学者，甚至我们解放后编辑出版的《辞海》《纪昀》辞条中，也用盖棺论定的口吻赫然写着：“多宣扬封建伦理观念及歌功颂德之作”。可见鲁迅先生早年所担心的“易堕”，现在不是“易堕”，而是“已堕”的问题了，不能不说是鲁迅先生的目光犀利和言之不预也。

鲁迅先生又说：“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隼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鲁迅先生公正地指出我的祖先的著作“发人间之幽微”，“隼思妙语”“亦有灼见”“天趣盎然”，尤其可贵的是，他指出纪昀的书之能留传，“后来无人能夺其席”，绝不是依仗他当时的权势：“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而是凭着他的思想、才学和文学的价值。绝非当今某些结帮拉派者，仅凭“阵地”与“吹鼓手”者流。

轻易给自己的对手或帮手“戴帽”，使用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以制服别人，乃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五十年代我生逢盛世，但不幸却坠入一场政治深渊中，戴上了“荆冠”。我和我的祖先虽已远隔六代，但他也象他的六世女孙一样，同样赢得了一顶“宣扬封建”的“帽子”，可见在那个时期，活人不可避免，死人难道就能逃脱么？幸好那个可怕的年代终于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和越过了。

尤其可喜的是，我的祖先在他长眠于地下一百七十九年，进入八十年代的今天，他得到了当代著名老作家孙犁同志的褒奖和推崇。他在写给我的《关于纪昀的通信》中，在叙述了纪昀的一生经历之后，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不是近年来才得到好评。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作。我曾有一部商务出版的万有文库本，那样小的字，还有四十多本，是一部内容浩瀚的大书。它一直享有盛誉，随着年代的推移，它的价值，将越来越高，百代以后，它一定会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

孙犁同志接着又说：

“令太高祖为四库书所作的《提要》，在有清一代，已经被誉为“‘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辞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

他还说：“我以为更难得的是，象这样的学术著作，使人读起来，并不感觉枯燥，并且时常有他那独特的幽默犀利的文笔出现，使人于得到明确的知识之外，还能得到文学艺术的享受。”

“当然，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经过这一次纂修，中国文化遭到了一次浩劫。但事物总是要一分为二的，这一反动措施，也带来一些正面好处。除去它辑存了一些已佚的古籍（如从《永乐大典》辑录的一些书），最大的成就，就是纪氏所撰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

我认为这一评价是极其合乎唯物辩证法的，因而也是科学的和公允的。

说到我祖先的《阅微草堂笔记》的成就，他指出：

“《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成就很高的笔记小说，它的写法及其作用，都不同于《聊斋志异》。直到目前，它仍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

看，这评价是多么大胆、公允而不落市俗！他曾说：“鲁迅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我认为孙犁同志的这个“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别开生面的评价，正是在鲁迅先生客观评判的基调上得出的结论。

他还说《阅微草堂笔记》引申出和近代一些死抱着“封建、因果”论的大人先生们迥异的想法，他指出“这是一部非常真实的书，纪昀用他亲身见闻的一些生活琐事，说明社会生活中的因果问题。它并不是唯心宿命的，它的道理是从现实生活中演绎出来的。因果报应，并不完全是迷信的，因果就是自然规律。”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考虑他的历史处境，”看，这

种治学和评史的态度跟那些动辄就给别人扣帽子的人是有着何等的天渊之别！

说到纪昀的文学功力，孙犁同志指出：“至于文学之简洁锋利，说理之透彻周密，是只有纪昀的文笔，才能达到的。我常常想，清代枯燥的考据文学，影响所及，使文学失去了许多生机。但是这种一针见血、无懈可击的刀笔文风，都是清朝文学的一大特色。”

他称颂纪昀是“真正的才子”，但在叙述了纪昀在乾隆皇朝那位“高人一等”“自是”的皇帝手下，有很多难言之苦，因而有许多“自屈自卑”的历史处境后，也公正地指出，“他所留下的《纪文达公遗集》，实在没有什么内容，都是应酬之作，纤细轻浮，故流传不广”。这一实事求是的批评，也是经过审慎研究而做出的答案和评价。

总之，当粉碎“四人帮”、思想解放、学术禁锢打消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位文化名人，我前面引证这么多前辈和今人对他的论述，就是希望给今日之研究者，做些有价值的、值得赞赏的参考资料。

由此而引申，我以为，做这项对古人评价和批判的工作，目的是让今人看。因而对古人的评价一定要持唯物的历史的观点，根据历史环境和他的历史处境，实事求是地提出他的优缺之所在，这对于今人无论是增长知识还是增长见地，都是大有裨益的。多年来，我看到在介绍人物评论或作品时，差不多千篇一律都写上“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性”这句话。的确，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个人是不受时代的

局限的。那么推而论之，我们这些现在还活着的今人，等我们做古，再过若干年后，有人再评价我们时，难道就不写上“受时代的局限性”吗？因此，为了给后人做个榜样，我们在书写这个“局限性”时，不应是扣帽子，而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做科学分析，然后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才是正确的态度。反之，如果弄得不好，那顶帽子在我们死后也飞到我们自己的脑袋上的。

二

今年五月，我为了写《纪晓岚传》，特意回到我的故乡老家。听说我是搞写作的，又是来搜集材料的，无论是我的亲属和村里的乡亲，对我都格外的欢迎和优待。他们通宵达旦地给我叙述有关纪昀的各种轶闻轶事，说的那么活灵活现，仿佛他没有死，而就生活在我们身边那样。他们那种津津乐道、滔滔不绝的、引以为荣的精神状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夜晚，我躺在我同族的哥哥家的土炕上沉思着，我以为乡亲们如此热情，是在对待纪昀的后代清算了封建剥削之后和其后的“文革”浩劫涤荡过去之后，在清醒的和平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人间普遍的情谊，我看出我的乡亲们和我一样把以有这位文化名人为同乡而引以为荣。

可惜的是，当我有记忆的时候，我没再回过我的老家，因而关于我们的老宅——那一片青砖瓦舍的宫殿式的府邸，我只是从我父亲和叔叔的嘴里听到过描述，当然那

是极其辉煌的。不过，据说那座巨大的府邸，并不建自纪昀为官的时期，因为纪府门上过去一直挂着御题的“三世一品”的匾额。可见这是经过三代的经营而成的。

这次我回家，我的本家和乡亲带着我看了整个村容，并指给我那片府邸的遗址，应该说，那不过是一坯黄土而已了。总的来说是一片荒凉。只有公社的大院里还有几间灰色的低矮的房屋，是用原来埋在地下的地基大砖盖成的。

公社干部向我叙述了土地改革时的情况，我的亲属向我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所遭的浩劫，总的来说是土改时扒了祠堂，文革时扒了坟墓。一位农民用无限惋惜的慨叹口吻说：“唉，悔不该当初把那深宅大院扒了，分了砖头，要是象孔庙那样保存到现在，我们这儿开个旅游点，让人参观，我们早阔了。唉，可谁长了后眼呢？我们庄稼人就是看不到那么远呀！谁承想有今天这样呢？”

是的，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跑了一圈儿，看见不少地方的名人府邸、祠堂、庭院都修葺一新，接待来自各地的游人。特别是南方诸省，尤其是海南岛。秭归的屈原故里、蒲松龄的故居、施耐庵的故乡，这不用说，那自然是应该搞得好些的，但在海南岛，除了海瑞、苏东坡外，连一位进士都要受到尊重而立有祠堂的。我以为崇敬文化名人，这是有文化的表现，相形之下，南方与北方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想，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绝不是地理条件所造成，而是北方和南方在文化修养方面的差距所使然的。

我记得有一次著名的学者杨柳桥老先生为纪昀事给我

写过一封信。他说他一向崇敬我的祖先，他以有我祖先这样的同乡人引为骄傲。他还说，北方象纪昀这样的人物还是“屈指可数，甚至是仅有的一位，比不了南方。他慨叹说：我认为北方对这位文化名人的对待，和南方相比，似乎过于冷漠而不太公正，你做为后人，最好提倡一下”。

我认为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我以为我以上所说的南北比较，绝不是仅仅站在是纪昀的后代立场提出的。

今年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有一则北京宣武区委决定修葺一系列有影响人物的故居消息，内中就有纪昀在北京虎坊桥居住过的“阅微草堂”。更可喜的是，院内还有他亲手栽种的一株花木，这使我非常的高兴。这则消息我当即说给陪同我一起回乡的县委副书记张金花同志，并建议她到南方那些文化名人的故乡去参观一下，自己亲自有一番实感和比较，那就会把纪昀的故乡、故居兴建装点一番而招徕世界游人。此次回乡，还得知纪昀的许多散居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外的后代，都纷纷地往家来信说：“我们小时常听老人对我们描述家乡的风光、宅第的模样，不知现在怎样了？我们多么想回到家乡，亲眼看看我们那宫殿式的房屋，皇帝的赠匾啊！”

我当着县委书记的面读着这封信，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和感想。我多么想给所有的人——也包括纪昀的后代在内，这样一个良好的印象啊！即我希望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个年青而又古老的共和国，具有一个高度教养的

文明国家的形象。

使我更为喜悦的是，这次回到故乡，也遇到了一位热心搜集我祖先楹联和轶闻的作者朱惠民同志。他为了搜集材料，或徒步、或骑车，从献县城里行程数十里来到我族兄纪清范门下，拜师求教，风雨无阻，历时六年有余，他这种坚持不懈、程门立雪的精神，使我这个纪氏后裔不仅深受感动，而且也感到惭愧。

朱惠民同志经过前后十来年的努力，数次增删，终成一册。我粗读一遍，觉得其中有些我早就听父亲说过，有些则是陌生而新鲜的。经过这次整理，汇集成集，我说这是一件善举。

孙犁同志在《关于纪昀的通信》中，在指出他的“应酬之作”，纤细轻浮后又指出：“但他弄的这些楹联之类的小玩艺，却很有意思，是别人不能及的。”我认为这评论也是恰如其分的。把这些“别人不能及的”“小玩艺”，奉献给今天大搞四化建设的广大读者，供他们在工作之余，茶余饭后作为一种艺术欣赏和精神消遣，则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此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时，我说了以上许多多余的话和为作者朱惠民说几句辛苦的话，就做为这本小书的一篇不成格局的序言吧！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目 录

幼年学对	1
代兄答对	3
答棋道士	4
智惩恶道	5
对石先生	7
巧写状纸	9
过目成诵	12
诗讽文贼	14
孟德曹操	16
诗之肥瘦	18
为文之道	20
门前易对	22
寓褒于贬	24
通州妙对	26
郊游对句	27
请假对对	28